



周天勇：什么原因造成了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工业 产能过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在学术和政策讨论圈，曾经将工业产能过剩归因于投资过大，生产力建设超过了市场需要。因此，对策是去掉过剩产能。我曾经也冒出过这样的念头。然而，去产能已经多年了，产能依旧年复一年地过剩。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深层次是二元体制造成了连续性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常态性的生产过剩。

1. 对于二元体制及其消费需求流量的解释

从需求看，消费与投资 and 出口相比，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变量。一国消费需求的繁荣和萧条，决定其投资需求的上涨和下行。从长期来看，经济周期往往与人口增长变化的消费需求，以及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决定的投资波动有关。消费总需求中，居民消费是基础，政府消费是人口规模决定的

社会管理衍生消费。从人口、经济和国土小国来看，由于市场和生产规模比较优势弱，可以参与国际经济市场和生产的分工协作，国际投资和出口成为其宏观经济平衡和实际供求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大国如果主要依赖于外部国际投资和出口需求，扩大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由于居民消费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变量，出口变量受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较大，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调控的关键是处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当经济景气下行时，用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当经济景气过热时，用收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缩投资。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场景中，如果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单纯由流动性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可以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来解决。

从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看，向外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是基础性需求。企业原料和设备等需求是否旺盛决定于消费规模是否景气；政府公共设施投资需求，需要考虑消费与投资、生产投资与公共投资、GDP 政府与企业及居民分配、政府债务与收入等等之间合理的比例，科学地确定其适度规模。在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格局下，单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在预算中劳动成本的持续下降，传导到消费流量的效果并不理想。

服务业总体上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资产稍重的服务业行业中，旅游景区在消费需求收缩时影响较大但比例不高，教育和医院等必需消费则属于必保支出，而其他服务需求收缩的服务业产能因轻资产而容易及时出清。

农业生产的是必需消费的食品，消费需求收缩时，其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大。

工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比农业和服务业都高得多，其重资产特征意味着其产能在短期内出清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生产过剩，主要是指工业产能的过剩。

所以，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看，主要还需要从工业产能的过剩程度去深入分析。2007—2020 年间，因出口总值占 GDP 比例的逐步下降，中国国内需求也相对不足，其不能对出口相对收缩进行替代，形成了持续工业产能过剩的趋势。这一时期，债务量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速度高于 GDP 的增长率，但也未能理想地促使国内需求增加而平衡工业产能过剩。中国这样长期产能过剩的机理并无法以中短期竞争性市场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模型去解释，只有从二元体制造成“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循环梗阻和流量大小去观察其形成的内在机理。

那么，是什么二元体制原因造成了生产的长期过剩？从一元市场经济与二元计划行政与市场调节并存体制的对比看，有以下“人口—劳动力—资产—生产—分配—收入—消费”循环的扭曲特点。

首先，人口前期增长变动影响后期消费变动方面，20 年前未实行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标准值从 2.1 向 1.8 变动，而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扭曲值从 2.1 向 1.22 变动。从 20 年前人口变动影响 20 年后国民经济收入、消费和 GDP 变动定律看，实行人口生育管理社会自动调节、政府

指导性计划和行政生育管制不同的体制，其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从高速向中速下降，最后从中速向低速转型，各自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自动调节的国家从高速向低速转型的时间较长，老龄化来临较晚；指导性计划生育的国家次之，如果处理得当，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高速增长时间足够，实现了先富后老；而生育管理较严体制，则有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迭代收缩较快，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可能有未富先老，居民需求水平不高的风险。

其次，人口迁移受阻影响收入提高波及消费变动方面，(1) 标准水平：未对人口迁移进行干预的国家，在人均 GDP10000 元水平时，人口城市化水平标准值为 75%左右，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为 11%左右。(2) 体制扭曲情况：我们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目前在人均 GDP 为 10000 美元时，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扭曲值为 63.89%，户籍城市化率扭曲值为 45%，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扭曲值为 23.6%，这必然传导影响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再次，土地从农村和城郊集体所有向城镇、工业、交通水利建设国家所有配置时，(1) 标准规则：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标准规则：不同所有者之间等价交换，土地交易在不同所有者之间交易，收入大部分归土地原所有者所有，政府按不同的比率收取土地交易税，最高可能为 40%。(2) 扭曲规则和扭曲值：但是体制性的扭曲是，农村城郊农民集体土地是生产资料（耕地等）和生活资料（居住用地），不得向市场

交易，价值为零；政府从农村征收的土地变成国有，一部分向交通、水利、教育、医疗和行政管理等用地划拨供应，另一部分通过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市场向购地的工商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高价出售，而返回农民的补偿部分占地方政府出让土地总收入的 3% 左右。

最后，从城乡居民住宅“拥有一交易—购买—经营—收入—消费”配置互换的经济循环看，（1）标准规则 and 标准值：市场经济国家住宅一般的标准规则为个人永久所有，住宅作为资产，可交易、可定价、可抵押、可继承；住宅投资、建设和供给方面可以个人购地投资建房、住宅合作社购地建房、房地产商开发建房和政府建设公租和廉价房，多元化竞争性和政府补充供应住宅；在房屋价格方面，市场经济国家，住宅房价居民收入比标准值在 3—6 之间。（2）体制扭曲规则 and 扭曲值：中国农村和城郊住宅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从现行各种法律规定的组合看，农民的住宅无法向市场交易，无法定价，不能够抵押，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可以继承；城镇居民商品性住宅最长年期为 70 年，期限内使用财产权为居民所有，到期后是否无偿接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城镇居民 70 年内住宅可以交易、可以定价和抵押，由于垄断供地和垄断供房，2020 年全国城镇住宅平均每平方建筑面积价格为 10020 元，2000 年—2020 年间，房价城镇居民收入比为 9.26，农村居民为 28.52。

依据这些二元的标准规则 and 标准值与体制扭曲规模和扭曲值的差别，可以计算人口迭代收缩、居民迁移受阻、土地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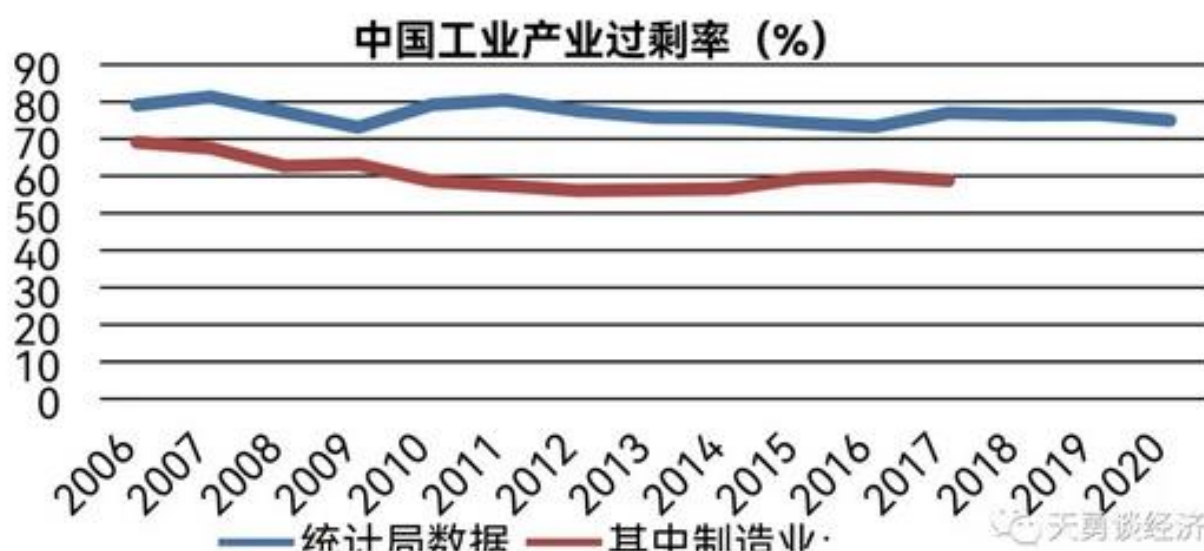
四个方面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收缩，并观察各自对工业产能过剩的贡献。

2. 中国 2006 年以来的产能过剩情况

2008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 2010 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对企业贷款的力度。大规模投资推动着中国工业产能的快速扩张。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第三波上行增长是 1980—1987 年，1988 年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使得 20 年后的 2008 年开始，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逐步放缓，特别是 2012 年开始劳动力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增幅会下降，从而使工业品销售的国内市场容量增长也会放缓，发生工业产能的过剩。

张林（2016）对工业产能过剩有综述综合性研究：第一，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 2012 年国别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稍低于 80%，2015 年制造业平均有近 30% 的产能闲置，约 35.5% 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 75%；2008 年至 2012 年初，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产能分别增加了 2.4 亿吨、10.3 万吨、800 万吨、3.4 亿重量箱，而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 72%、73.7%、71.9% 和 73.1%；有色金属行业产能利用率 65% 左右，光伏、风电设备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 50%。第二，产能过剩从行业产业链某个环节或某种产品向整个行业蔓延。比如，2009 年钢铁行业主要是部分高端板材产能过剩，而 2015 年已经蔓延到全国 26 个主要市场，涉及几乎所有钢材品种；光伏产业由 2009 年的多晶硅产能

过剩发展到硅片、电池片、电池组等多个基础环节的严重产能过剩（王晓姝、孙爽，2013）。第三，产能过剩从少数行业向多数行业蔓延，日益呈现出鲜明的全局性特征。2006 年全国仅有 10 个制造业被国务院列为产能过剩行业，2009 年已上升到 19 个，产能过剩行业已经从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逐渐蔓延到氮肥、电石、氯碱、汽车、机械、铅、铜、电解铝等众多高端产业，甚至包括多晶硅、光伏、风电设备、太阳能等新兴产业（李晓华，2013；杨振，2014；陈剩勇、孙仕祺，2013）。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158

